

『对话』语境中的

钱钟书文学批评理论

陈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

钟

书

文

『对话』语境中的

钱钟书文学批评理论

陈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大连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语境中的钱钟书文学批评理论 / 陈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3681 - 2

I. ①对… II. ①陈… III. ①钱钟书 (1910—1998) - 文学评论 - 理论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9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编

谈艺之本：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思路与人文根基

第一章 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思路	(7)
第一节 探索萌芽：谈文论艺觅“美踪”	(7)
第二节 深入发展：中西互证探“文心”	(12)
第三节 圆通成熟：文学文化相互“贯通”	(17)
第二章 钱钟书变易不居的性情学养	(26)
第一节 自由无障的痴者之心	(27)
第二节 丰富深厚的艺术素养	(32)
第三节 辩证通脱的哲学思想	(39)
第三章 钱钟书和而不同的学术渊源	(48)
第一节 浩博厚重的家学“文化群落”	(49)
第二节 兼重中西的清华“文化群落”	(54)

第二编

对话之蕴：钱钟书文学批评的特定语境与核心精神

第一章 中西“对话”思想之对话	(59)
第一节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对话”精神	(59)
第二节 西方哲学中的“对话”思想资源	(62)
第三节 “对话”学理的中西同构	(64)

第二章 钱氏“对话”的多重内蕴	(67)
第一节 基本精神：“通观一体”	(68)
第二节 核心原则：“和而不同”	(71)
第三节 中介平台：“他者之镜”	(75)
第四节 运行机制：“视阈融合”	(78)
第三章 钱氏“对话”的内在文化诉求	(81)
第一节 古今相承通变	(82)
第二节 文化多元互通	(84)

第三编

文心之探：钱钟书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与隐性架构

第一章 “通天”之心：钱钟书文学本体批评论	(89)
第一节 文学与审美：“诗画一律”与“诗画相异”	(89)
第二节 文学与人心：“文如其人”与“文人不一”	(94)
第三节 文学与现实：“诗史一家”与“诗史分异”	(99)
第四节 文学与自然：“摹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104)
第二章 “心匠之运”：钱钟书创作规律批评论	(107)
第一节 主体才能：“才而不学”与“才须学也”	(107)
第二节 创作动因：“发愤著书”与“不平则鸣”	(113)
第三节 情感投入：“执情强物”与“物我情契”	(118)
第四节 灵感揭秘：“应感之会”与“神秘经验”	(123)
第五节 物化难度：“得心之难”与“应手之难”	(130)
第三章 “文字之妙”：钱钟书文学文本批评论	(135)
第一节 语言痛苦：“言不尽意”与“言可尽意”	(135)
第二节 文体区异：“文各有体”与“文无定体”	(141)
第三节 文本层次：“拟象不即”与“取象不离”	(147)
第四节 文本间性：“蹈迹承响”与“暗与其合”	(154)
第四章 “出入”之感：钱钟书文学鉴赏批评论	(163)
第一节 主体素养：“作者能鉴”与“作者不鉴”	(164)
第二节 读者作用：“诗无达诂”与“文有定价”	(168)

第三节 鉴赏模式：“涵泳本文”与“通观圆览”	(173)
第四节 阐释策略：“以反求覆”与“阐释循环”	(175)
第五节 衡文尺度：“以文为断”与“以人为断”	(179)

第四编

品性之态：钱钟书文学批评的理论个性与学术贡献

第一章 钱钟书文学批评的美学品格	(189)
第一节 人文之蕴：“近取诸身，以文拟人”	(190)
第二节 游心之趣：“无稽而未尝不经”	(193)
第三节 求真之品：“不容以一说弊一字”	(196)
第四节 圆浑之境：“融化百花而自成一味”	(199)
第二章 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学术贡献	(203)
第一节 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当代建构意义	(203)
第二节 对当下学术研究范式的启示意义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19)

绪 论

“钱钟书”（1910—1998）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在 20 世纪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生著述丰赡，既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等学术经典专著，也有《写在人生边上》、《人·鬼·兽》、《围城》、《槐聚诗存》等不同文体的佳作。这些著述建构起了一座瑰丽、奇伟的人文景观，引发了学界普遍又持久的研究热潮。然而，在多年的“钱钟书热”中，研究者们一直对他毁誉不一，分歧极大。褒之者称他为“文化昆仑”、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贬之者认为其学如“七宝楼台”，只是炫人眼目，碎拆下来，却不成片段。

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论断缘于对钱学体系性与学理性认识上的差异。作为一代“博学鸿儒”，钱钟书是否有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他的理论贡献何在？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成为钱学评价中的焦点问题。围绕着这一焦点，学界在热烈的争鸣与探讨中，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钱氏只能代表学问的高度，其学术研究却既没有体系也没有思想，在他身上甚至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性缺欠：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如葛红兵在《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写份悼词》一文中指出，目前的钱学研究已将钱钟书“神化”，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有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识者，“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因此不属

于建构性的思想家”^①；与葛氏的观点相似，李泽厚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具有有长久价值的。我问一些人，大都讲不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问题所在”，“博闻强记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拿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②此外，王晓华、汤溢泽等诸多学者也都认为，钱钟书这座“文化昆仑”并没有将中国文化提升到令中国人真正感到自豪的高度，尤其是没有弥补现当代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欠缺。因此，从理论体系建构的意义上来看，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伟大的思想家”等“圣化”行为，“超过了钱钟书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③。

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纯正的人文学者，钱钟书以精邃的学问、深卓的识见和对学理、艺道的彻悟，通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著述，展现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王水照的见解。他认为，钱钟书虽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但在其著作中，具体文艺事实“莫不‘理在事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④；杨义也认为，钱钟书的学术“以独特的形式蕴含着往返于中外古今的大智慧，以学术的片断性展示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不阅读钱钟书，是不能全面地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品位极境和智慧深度的”^⑤；……可以说，“无体系的体系”是这一派对钱学智慧风貌的生动概括，但究竟这一“体系”的内在结构与逻辑机理何在，该派学者们还未对此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因而欠缺说服力。

钱学究竟是炫人眼目的“七宝楼台”，还是臻于艺术至境的“无体

① 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

② 李泽厚：《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③ 王晓华：《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1期；汤溢泽：《对圣化钱钟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④ 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钟书先生》，载李明生、王培元《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⑤ 杨义：《钱钟书与现代中国学术》，《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系的体系”，这个钱学评价中的核心问题至今尚未厘清。笔者认为，钱钟书的知识学问与理论素养是兼而有之的。在《谈艺录》、《管锥编》等批评著述中，他凭借自己渊博丰厚的学养、通达深邃的识见以及烛照纤毫的眼光，每每于文学现象及作品的精妙阐释和对前人文评思想的“圆照周览”中，创化出许多精深透辟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文评理论。这些理论识见不仅是对古今中外文论精华的“广采博纳”，更体现着他对于文学堂奥深入独特的洞察，它们极大地丰富并超越了前人的言说，为现在和将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种种新鲜的思路与启示。而且，尽管它们以零散、破碎的思想片断形式存在，但在随意性的表象之下，却内隐着严密的逻辑性与统一性，存在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观念与规则，从而构建起了一个“潜在”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大厦。这一隐性的理论系统以“对话”为特定语境及核心精神，将文学本体批评论、创作规律批评论、文学文本批评论以及文学鉴赏批评论这四大板块统辖起来，不仅完备自足，而且圆通灵动、自由开放，具有深刻的学理性、灵活的实践性及鲜明的个性色彩，充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

诸多质疑者之所以会得出钱氏知识学问大于理论贡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并未深入了解钱氏文学批评理论的奥义及特色优长之所在，也忽略了他汲取中西古今文论精华而打通融汇的富有成效的努力。

在笔者看来，在钱学评价问题上，容易造成评价者“误读”的两方面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是钱钟书知识学问的特殊丰富性。远远超出常人的博闻强记使钱氏的渊博知识极为耀眼而盖过了其深邃思想的光芒。行文中，他常以渊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联想能力，对古今中外的文论话语、文学作品、文化风俗、历史典故、名人轶事以及佛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学问综合运用，兴之所至，连类而及。这就较易造成一味炫耀学问而无学术建树的印象“迷误”。

其二是钱钟书批评实践的特定取向与范式。钱氏的文学批评是作家作品批评与理论批评的一体化，主要侧重于应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重在对具体现象的微观探讨。支配着其分析、评价活动的理论性原则虽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系统性，但却隐而不露地散在于文本的

字里行间，外在地显现为零星、破碎的“思想片断”形式。因此，研究者如果不经细致的梳理与深入发掘，是难以探悉其本来面目的，更难以正确地论定其学术价值与贡献。

钱钟书之所以乐于选取这种批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注重灵活性及实用性的批评范式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自身的审美情趣与批评观念使然：其一，作为无锡人的钱钟书有着地域学人的典型学术取向。在长年农田鱼塘、茶果桑竹、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中，历史上的无锡人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精微、细致、缜密的思维行为倾向，从而积淀起了“类”意义上的无锡地缘人的气质风貌。而在这片灵秀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钱钟书也秉承了地缘群体的思维倾向与审美情趣。他主张“不耻支离事业”，感兴趣的是务实、精微的现象研究，尤为擅长对具体文本及文学现象细腻的阐释与梳理，而反感空洞无物的体系架构，从不凌空高蹈。其二，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对于现当代文艺学研究中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建构的趋势有着明确的反思意识，对带有明显西化烙印的“系统化”研究模式本能地抗拒。在他看来，历史上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哲学系统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与此相较，“片断思想”却仍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因此，以追求心灵之自由放逐与思想之“逍遥游”的他，并不刻意构建恢宏的理论大厦，以避免为自己“随心所欲”的批评实践划定行为的疆界。

事实上，研究旨趣上的“破体为用”与理论著述中实际上的“化用为体”，显示出了钱钟书思想中内蕴着的矛盾：一方面，他致力于文学批评的现象考辨，强调感性生动、精微发见；另一方面，他又欲以批评的“小结裹”服务于理论的“大判断”，向理性综合靠拢。这观念上的二难挣扎，在“悖论”中包蕴着无限的张力与创造性，使钱钟书的批评理论进入了一个丰盈而富有弹性的崭新的话语空间，这就是：倾心于直观印象的会悟，又不失理性科学的审视；远离学究气的穷研，又不乏有深度的力索。在印象中有理性、感悟中寓谨严的批评世界里，它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宏博优美的理论天地。

因此，钱氏文学批评理论既不同于侧重感性微观考察的中国传统文评，也不同于以理性宏观见长的西方文评理论，任何一个既定的评价体系都不能准确地论定它的实际价值与意义。

第一编

谈艺之本：钱钟书文学批评的 思路与人文根基

第一章

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思路

作为批评家的钱钟书，一生有着浓厚的“谈艺癖”，他在论文中“谈艺”，在学术著作中“谈艺”，在小说中“谈艺”，甚至在散文和诗中也利用一切机会“谈艺”。这些“谈艺”之作虽处于异时异地，甚至异体，但却以内在固有的逻辑性与同一性，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开放性、互动式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空间，展现出了钱氏学术思想的恢宏之象。

然而，任何一种思想境界的生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纵向的历史维度上来看，钱氏的“谈艺”思想同样也经历了嬗变与发展的历时性理路。从开启了他批评之路的单篇论文《小说琐证》，到标志着其学术思想之大成境界的鸿篇巨制《管锥编》，一方面贯穿着他始终如一的立足文本、矢志创新、连类打通等谈艺旨趣与理念；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些许嬗变：由早年纯文学范围内“零星随感”式的“谈文论艺”，逐渐上升到了对人类文学与文化“圆照周览”式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兼容文学与文化；由专注于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逐渐重视对外部规律的研究，兼顾审美与人生；由对文艺理论的相对轻视转而为重视，兼及实践与理论。

第一节 探索萌芽：谈文论艺觅“美踪”

从1929年入清华大学始，至1938年于英、法留学归来回母校清华任教止，这近十年的时间是钱钟书平静安逸的学生时代^①，也是其文学

^① 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必须具备大学教学两年以上的资历，因此钱钟书放弃了在清华读研究院的机会，于1933—1935年两年间，就任于上海光华大学，以备留学考试。见其佩《青年的钱钟书》，《新民晚报》1988年10月5日。

批评生涯的初始时期,《小说琐征》、《一种哲学的纲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者五人》等一系列论文及书评开启了他的批评之路。在这一时期,他的批评思想还处于探索萌芽阶段,主要聚焦于创作中的具体问题,以寻觅和鉴赏艺术之美为基本旨趣,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纯经验的随心所欲,但已经萌生了探测人的心性灵魂的治学情趣、中西文学平行映发的批评意识以及挑战权威的学术个性。

以“中书君”为名发表的考据性文章《小说琐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钱氏较早的学术论文。该文将前人的笔记、小说、诗话、文集、经书、佛典与戏剧中的某一故事的相似记载摘录出来,进行考证比勘,探求这些故事的实际来源。如据他考证,《西游记》中“比丘怜子遣阴神,寻洞擒妖逢老寿”这一情节,并非如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中所说出自《旧唐书·杨虞卿传》,而很可能是取材于唐人张读的《宣室志》;《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记安老爷至邓家庄祝寿一节中,安老爷解释《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的话,实际上全袭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四《论语解》四章之一中的见解。^① 这些用归纳、演绎、排比等方法作出的探求索引严谨缜密,初步显示出了钱钟书渊博的学识以及注重文本细读与“连类”打通的治学情趣。

钱钟书在学生时代发表最多的是书评,这些书评风格迥异,或诗人式的浪漫抒情,或学者式的通达睿智,或散文家式的通俗直白,显示出了他“多面手”的批评潜质以及“零星随感”式的批评方式特征。从这些引领着他走上批评之路的“随心所欲”之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批评思想的些许萌芽。

其中,《美的生理学》一文显示出了他对心理学批评方法的兴趣与见识,为其日后恰当娴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具体的文艺批评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章以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为例,提出文学批评如要达到准确性,并非仅仅靠吟啸于书斋之中,一味“泛览乎诗书之典籍”可以了事的,还应适当地借鉴心理学等科学方法与成果。《落日颂》一文强调创作主体审美心理体悟的深化,显示出了他注重探讨作品

^①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6—89页。

美感特质及作家审美心理体验的批评观念。文章认为,要使作品达到蕴藉隽永的审美效果,除了注意字句和修辞之外,还要经过多年“性灵的滋养和潜修”,以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的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的和墨色的,徜徉着拉比(Rabbi)精灵的魔术里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①。《旁观者》一文初步阐述了钱钟书的文学本体认识,奠定了他日后所形成的“大文学”观的思想基础。文章强调,文学是时代历史发展中各种平行的意识形态因素之一,“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这些因素彼此之间原初没有前因后果的关联,而是相互“映射阐发”^②。《作者五人》一文满怀憧憬地表述了他的研究梦想:要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一切把糊涂当神秘、呐喊当辩证、自登广告当著作的人,恐怕在这本梦想之书里是没有地位的——不管他们的东西在世界上,不,在书架上占据着多大地位。所以,你看,这本文学史是当不得人名字典或点鬼簿用的”。^③

这些书评文笔老到、笔锋犀利、说理透彻、旁征博引,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阅读和欣赏的范围之内,带有某种随心所欲的色彩,有许多少年意气风发的“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但却以自由清新的学术尝试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独立灵通的学术观念进行着思想的自我蜕变。由这些书评,我们不难看出他早年纯正的学术态度与审美倾向性。

从批评实绩来看,学生时代的钱钟书已经初步显现出了无锡及“海派”学人典型的研究取向,即对于现象具有一种自发的形而下的体认。他把尊重现象及微观考察视为文学批评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往往将自己的理论观点寓于具体现象的考辨之中,而不直接谈根本的理论。《中国

①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5页。

② 同上书,第281页。

③ 同上书,第291页。

新文学的源流》^①却是集中阐发理论的例外之文，颇值得关注。该文通过对“文学”、“诗”、“文”等不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分析，通过对传统诗、文的文体职能与各自特征的考察，驳斥了周作人所提出的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载道”与“言志”两种思潮交互循环的观点。文章指出，在传统文学中，诗、文“分茅设”，各有各的规律与使命，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各各不相容的命题”。以文载道，以诗言志，在同一个作家那里可以“羽翼相辅”，并行不悖。这一阐释不仅有力地纠正了周说的谬误，也显示出了钱钟书所怀有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怀疑精神。

除此之外，集中阐发钱氏早年批评思想的还有《中国文学小史序论》^②一文。该文认为，文学演变的历史有着自身的内在因果关系和特殊的审美发展规律，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探究和揭示各种文体作品内在的行文结构、语言表达与艺术境界等方面的美感特质，“考论行文之美，与夫立言之妙”。批评不应将“可歌可泣”视为好作品的衡量标准，“仅以‘可歌可泣’为标准，则神经病态的文学观而已。且如报纸新闻之类，事不必奇，文不必丽，吾人一览标题，即复兴奋，而岁月逾迈，则断烂朝报，无足感人；盖时事切近则易于感激，初不系乎文章之美恶，代移世异，然后真相渐出，现代文学之难于论定者此也；倘仅以‘曾使人歌使人泣’者为文学，而不求真价所在，‘则临猫生子’之消息，皆可为‘黄绢妇幼’之好词矣。”所谓佳作，“能呼起读者之精神魂魄，而复能抚之使静，安之使定者也。盖一书之中，呼应起讫，自为一周，读者不必于书外别求宣泄嗜欲情感之具焉”。而那些“放而不能收，动而不能止，读者心烦意乱，必于书外求安心定意之方，甚且见诸行事，以为陶写”的作品则为劣作。由此可见，钱钟书早年追求的艺术真价是纯文学的完美境界，这种注重文学的审美独特性的批评观念成为其日后批评思想体系的核心。

这一时期，钱钟书还在《天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以英文撰写的论文——《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该文以比较文学的视阈来审视中西

① 钱钟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

② 此文实际上在钱氏大学期间即已完成，后刊载在1933年10月16日第3卷第8期《国风半月刊》上。

方戏剧，希望以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观念为参照体系，达到重新审视和评估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历史局限的目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戏剧缺乏西方戏剧那种内在的悲剧精神，剧作家绝少关注人物在和命运顽强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的普遍不幸与崇高精神，常常展现外在的、表面化的悲剧冲突，而不深入挖掘人物身上可能存在的悲剧性缺陷。据此，他对王国维所持的《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悲剧中亦无愧色”的论点提出异议。在他看来，造成中国古代戏剧的悲剧精神缺失的内在文化原因是：一方面，强调情感与理性、社会与个人和谐统一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冲突双方的矛盾；另一方面，“消极的、失败主义的，并导致懒散迟钝、逆来顺受的态度”的宿命论也消解了古代中国人面临被命运捉弄时所爆发出来的激烈抗争精神。^①该文章见解独到、阐释细腻，初步显示出了钱氏开放的学术视野与注重中西方平等“对话”的学术意识。

这种充分尊重中西方文学文化各自的价值与作用，以互识、互释与互补的平等对话来促进异域文化交流的学术意识，在钱钟书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钱钟书本来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材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但未获导师许可，只好改作《17世纪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该文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细致梳理了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深入探讨了其传播的媒介、传播中的文化误读以及英国人观照中国的视角趣味之演变等相关问题。

在文学作品的比较阐释之外，钱钟书也将平行映发的目光投向文学批评。在英国留学期间，在对西方文学文化进一步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他以西方美学中的“移情说”为理论参照，认真思索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完成了一篇极为精彩的学术论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②该文深入阐发了中国“人化”批评的特点及其文化渊源。文章指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是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个重要特征。

① 钱钟书：《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天下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8月）。

② 该文最初发表于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上。